

贝克知识丛书

DEUTSCHE 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二十世纪德国史

Andreas Wirsching

[德] 安德烈亚斯·维尔申 著

张杨 王琼颖 译

非外借

上海三联书店

贝克知识丛书

DEUTSCHE 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二十世纪德国史

Andreas Wirsching

[德] 安德烈亚斯·维尔申 著

张杨 王琮颖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世纪德国史 / [德] 安德烈亚斯·维尔申著;
张杨, 王琼颖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10

ISBN 978-7-5426-6416-7

I. ①二… II. ①安… ②张… ③王… III. ①德国—
历史—20 世纪 IV. ① K5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3906 号

二十世纪德国史

著 者 / [德] 安德烈亚斯·维尔申

译 者 / 张 杨 王琼颖

责任编辑 / 程 力

特约编辑 / 苑浩泰

装帧设计 / Metis 灵动视线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32

字 数 / 78 千字

印 张 / 6

ISBN 978-7-5426-6416-7/K · 486

定 价: 28.80 元

这本关于 20 世纪德国历史的小书描述了从具有专制国家色彩的君主政体到扎根西方的民主与福利共和国的德意志道路。这期间横亘的是那些烙印在 20 世纪德国与欧洲历史中的经历：世界大战与民主的失败，独裁与罪行，分裂与统一。安德烈亚斯·维尔申的描述以追问德意志“特殊道路”为主线，尤其对常常充满矛盾的长时段社会发展给予了特别关注。

安德烈亚斯·维尔申，生于 1959 年，奥格斯堡大学近现代史教授。他上一本出版物是《魏玛共和国：政治和社会》（2000）。

前 言

20 世纪才刚刚结束。因此，撰写关于这段时期的一部“德国史”是一次不小的冒险，并且当我们不得不在极其狭窄的空间范围内来讨论这段时期时，这种冒险愈加明显。每一位通晓德国史的读者将不可避免地下面的行文中发现大量尚未提及的东西，同时也会抱怨某些内容太过粗糙或太过片面。但我仍希望，拙作在传递那些确切的基本信息的同时指明一些阐释的可能性，并能够实现其目标。

首先，我要感谢 C. H. Beck 出版社的德特勒夫·费尔肯博士，是他鼓励我进行这样的尝试，并以令人钦佩的细致审校了原稿；奥格斯堡的福尔克尔·多特魏希博士不辞辛劳地阅读了初稿，我要对他提出的那些批判性

建议表示衷心感谢；我还应感谢海克·费－阿格拜勒一直以来的热心工作和支持；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母亲罗斯玛丽·维尔申，她也参与了该书的审校。

安德烈亚斯·维尔申

奥格斯堡，2001 年 2 月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章

一条通向 20 世纪的德意志“特殊道路”	1
----------------------	---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民主（1914—1933）	22
-----------------------	----

第三章

独裁统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1933—1945）	66
-------------------------	----

第四章

战后与冷战时期：

两个德国的成立（1945—1955）	108
--------------------	-----

第五章

分裂的德国社会和政治·····	124
-----------------	-----

第六章

“特殊道路”的终结：德国年（1989—1990）···	151
-----------------------------	-----

后 记

从“黄金 80 年代”到 90 年代危机·····	159
---------------------------	-----

参考文献·····	163
-----------	-----

德中译名对照表·····	175
--------------	-----

第一章

一条通向 20 世纪的德意志“特殊道路”

现代化时代是否存在着一一条德意志“特殊道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早期的史学界看来这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但在 20 世纪初，可能许多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都会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只有少数人认为西欧民主的那套机制才能够解决德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难题，而多数人在西方文明中看到了堕落的征兆与功利主义的毫无节制。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普鲁士—德意志的“天命所在”，它似乎锻造出一个属于未来，结合了文化与权力、专制与自由、传统与现代的综合体。这一综合体所夹带的意识形态成就了这个民族国家：它的统一保证了一个强大国家的形成，以应

对即将到来的挑战，并为德国人保障其应得的“阳光下的地盘”。

建构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思想根源尤其根植于历史主义，而历史主义的特别之处是强调与普遍性相对应的特殊性。但除此之外，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深刻不信任的体现：大部分的德国精英彻头彻尾地反对工业化的现代大众社会所代表的利益多元化。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似乎极为轻易地蜕变为财阀统治与党同伐异；代表个人利益的组织及其所取得的集体性成果则被直白地斥为功利主义的有害的时代思想。但也正因为如此，促成了建立一个强大国家观念的形成：这个国家的政体形式是君主制，国家的职能是作为“超越党派（利益）”的集体福祉守护者，以此保护集体福祉，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分治。因此，这样一种对民族国家观和历史的理解，也表现出对撕裂民族和国家关系的内部冲突的深切担忧，这些冲突可以是社会的，或是世界的、国民的，或是宗教的。至 20 世纪初时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还太过年轻，以至于无法将其视为一个持续存在、历史悠久的国度。但在表面波澜壮阔的权力扩张背后就未曾潜藏修正历史的可能？威廉德国的光芒下就没有掩饰其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中的深刻裂痕吗？

事实上，基于其内部种种矛盾，可以轻而易举对威廉二世帝国进行一次毫不留情的意识形态批判。当时就已经有不少同时代人曾这样做过，并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过这个“没有国家观的大国”[赫尔穆特·普勒斯纳 (Helmuth Plessner)]。如果对很多人来说存在这样的假象，即权力与精神的结合在帝国时代臻于完美——人们仅仅考虑到德国大学和科学的空前繁荣，那么，有心的观察者不会对权重日渐从文化转移到了权力思想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弗里德里希·迈内克 (Friedrich Meinecke, 1863—1954) 在回顾往昔时直言不讳地提及那些否认自己的伦理与精神来源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蜕化”。无疑过度的权力国家思想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成为威廉主义政治文化的固定组成部分。由此也可以解释在这种文化下所受的痛苦。像特奥多尔·蒙森 (Theoder Mommsen, 1817—1903) 一样的人物也几乎因此而崩溃：他曾参加过 1848 年革命，是 19 世纪德国知识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但他却从根本上想变成另一番模样。“人是政治动物” (Animal Politicum) 的观念深埋在他的内心，他始终忠实于青年时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想，并因此承受着政治现实的痛苦，直至抑郁而终。在其 1899 年的政治遗言中，

蒙森坦言：“我……希望成为一个公民。但在我们这个国家却不可能（实现）。在这里，每一个人，即使是那些最优秀者，都无法超越这一代人所承担的义务和政治崇拜。”蒙森感到，从内心来说自己与其所从属的人民之间是一种割裂的关系。他宣布封存自己的遗物，以便不让自己的真实性格暴露于“我并不尊重的”公众面前。

蒙森肯定不具有代表性，但他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个为人所追求的、由权力和文化组成的综合体破裂了，而在一个以社会、经济和技术急剧变化为特征的时代也不得不破裂。因为这也是回顾帝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不可以忘记威廉时代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巨大变革压力与适应压力。在所有欧洲大国中，德国经历着最急剧的转变和最深刻的对立。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它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过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自然风光、商业世界、社会关系、道德纽带和政治格局均发生了变化。正如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 1860—1919）在1904年所指出的那样，“每个人都有改变旧思想的内迫力，即摆脱旧环境的渴求。”因此，当时一部分德国“过渡人”——人们对威廉帝国这代人的称呼【马丁·德里（Martin Doerry）】——面临这种适应任务感到力不从心也许就并不让人为之惊讶了。因此，

在一个传统价值观越发遭到质疑及稳定的价值导向标准一再缺失的时代，权力国家和民族轻而易举地成为一种宗教的替代形式。

如果将目光投向 1912 年选举产生的最后一届战前帝国国会就会得出一种变革的印象，政治多样性及德国局势中存在各种对立的印象。将近 84.9% 拥有选举权的民众都投出了选票，这一比例大于帝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选举。这一高参与率表明，帝国宪法中民主因素和男子平等普选权提高了政治动员与参与的程度。但轰动一时的则是社会民主党的选举结果。这个从前遭到排斥的、其成员被公开谴责为“国家公敌”的政党，一跃成为帝国国会的最强党团。社民党人获 34.8% 的选票及总共 397 个议席中的 110 个席位。其选民主要由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产业工人组成，汉堡、柏林以及萨克森的部分地区是社民党的票仓，这些城市中有超过 60% 的选民将选票投给了社民党；而在农村、小城市及天主教地区的选区，社民党的得票率则明显低于 10%。社民党毫无疑问是工人运动的政治组织，其选民人数从 1874 年的约 35 万增加到 1912 年的 425 万，这一增长同时也标志着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下德国经济结构的剧变。

在 1912 年帝国国会选举中，还第一次出现了社民党

和左翼自由党之间的选举约定。虽然这些约定并非总能得到双方的赞同，但它们却暗示着一种联合，它在未来尽管冲击力有限，但却构成了重要的政治潜力：1912年到1930年间，追求民主的资产阶级与改革导向的工人运动的合作一再成为一种议会政治的结晶，与之相连的则是对现有机构的继续发展及对议会制和民主化寄予厚望。

左翼的自由党是由多个组织于1910年新成立的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在1912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该党获得12.3%的有效选票及42个议席。其拥护者主要由受过高等教育的市民阶层组成，教授、公务员、律师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在其中占很大比例。进步党与其同信奉自由主义的姐妹党——民族自由党在社会结构上差别不大，其差别更多地表现为进步党一贯强调经济自由主义，尤其还要求在国会中拥有更强势的地位。此外，进步党还认识到古典自由主义有必要有限度地向“福利国家”转型。它认为，如果大部分民众尚未获得必要的物质和教育资源，那么就不足以将个体的自由发展作为政治信条。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思想）与“世界政策”，议会制的进一步发展及福利国家的干预，由此构成的纲领要点与社民党中的改革派力量有着不少共同之处。但民族自由党人却大相径庭：尽管在群

众基础方面，他们与进步党人相差无几，但却奉行一条严格反社会主义的路线，绝大多数人都拒绝帝国议会民主化，并在基本问题上对保守党持开放的态度。1912年，民族自由党获得 13.6% 的选票和 45 个议席。

保守党派则在 1912 年以 12.7% 的选票收获了他们在帝国历史上最糟糕的选举结果。只不过多亏了优先照顾人口稀少地区的选区划分，德国的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才总算共同获得了 57 个议席。作为一次持续下滑运动的终点，1912 年的选举结果表明贵族大地主阶级以及整个农业德国的融合与动员能力日益削弱。由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帝国时代的普鲁士德意志保守主义敌视改革的态度为何如此根深蒂固，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无法克服。保守党人奉行反议会制、反社会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政策。在民主选举出的帝国国会中，他们日益被孤立，并退回到大量他们依然保有的大量社会和政治权力位置上——在普鲁士邦，在君主周围，在军队，在高级官员群体中。

最终从 20 世纪初以来在帝国国会中占据关键地位则是中央党（Zentrumspartei）。这个天主教政党堪称德国政党体系中的一枝独秀，同时它赋予了维持至 1933 年的德国议会制度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征。在推行小

德意志路线的“俾斯麦帝国”（Bismarck Reich）中猝不及防成为少数教派的天主教徒于 1871 年成立代表自身政治利益的中央党，它首先具备了与社会民主党类似的结构性和反对党的职能。与社民党的情况一样，这一过程也伴随着由协会及其他天主教代言组织所组成的紧密网络的扩大，它们伴随着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然而，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这个曾经与社民党同为“国家公敌”的反对党，却逐渐转变为一个支持政府并准备与保守党及民族自由党合作的政党。自 1909 年起，掌握帝国领导权的议会多数由保守党和中央党组成“黑 - 蓝”阵营占据。但中央党在 1912 年遭到重创：其得票率从 19.4% 降到了 16.4%，仅获 91 个议席（1907 年为 105 席）。尽管中央党是承担着推动非同质拥护者融入社会责任的唯一一个德国政党，但与此同时，严格的教派之分及由此产生的地理限制也使得它在政治上的各种发展可能性变得很有限。知名中央党时事评论员尤利乌斯·巴赫姆（Julius Bachem, 1845—1918）提出“走出教堂塔楼”，面向非天主教选民阶层开放的要求，一直未得以实现；直至 1933 年，中央党仍是一个纯天主教的党派。

犹如一面凸透镜那样，威廉帝国的最后一届帝国国会聚焦着各种严重的对立、政治上的阻力，但同时也包

含着威廉德国的各种发展机遇。考虑到当时的两极分化，一边是位于莱茵河与鲁尔河畔、萨克森、德国西南部或柏林的现代工业区，而另一边则是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区。在莱茵兰地区的实业家和东普鲁士骑士大庄园主之间横亘着的，不仅是约 1000 千米的距离，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不同世界。同样，帝国的社会和经济重心从农业向工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既势不可当，又不容改变。1882 年时德国总人口的 41.6% 还依靠农业为生，到 1907 年这一比例仅为 28.4%。在此期间，工业及其相关行业从业人口的比例从 34.8% 上升至 42.2%。在帝国成立之初，仅有近 200 万人生活在 10 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但到了 1910 年则已经有近 1400 万人了。

与之相连的是工业化的另一产物，即在德国特别突出的阶级矛盾。当时，对于广大的德国资产阶级及农村贵族阶级来说，世界上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善的工人运动的存在是一个根本性威胁。对于生于 1862 年的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来说，一直“难以忘怀的”是“孩童时期的战战兢兢，当我走在上学路上……有一次不得不从正在罢工的、怒目相向的工人人群中挤过去”。事实上，工人运动难道不是激进地将资产阶级曾经以为神圣不可触犯的一切都打上了问号吗？它提出了集体主义和